

日记九十年

主編／自牧

第四十二卷



全国第四届民办读书报刊发展研讨会
暨读书型作家学者2006草原笔会

代表证

2006·8·26-30

全国第四届民办读书报刊发展研讨会暨读书
型作家学者 2006 草原笔会代表证（呼和浩特）



日记杂志·第42卷

主编:自牧 执行主编:于晓明

※ ※

日影书坊编印

普林达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47 千字 5.875 印张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静庐 淡庐

责任校对: 淡庐 潜庐

RYSF-2006-12-01·Z·42 工本价: 12.00 元

(内部交流)

释文：以文会友，博采众长



（山西大同杨远雄连体双钩书法作品选）

目 录

选刊·转载

- 日记:文献山脉里的“富矿”..... 邹振环(1)
《雷锋日记》出版内幕 邱 宏(6)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揭秘 佚名(10)
毛主席给我改日记 王桂芹(17)

日谱杂俎

- 董康和他的东游日记《书舶庸谭》..... 淮 茗(26)
《胡世宗日记》乃充实多彩的生命长征史 ... 袁 鹰(31)
《半月日谱》:一本别致的趣书..... 燕 语(35)
钱钟书先生与日记 高远斋(38)

日记原版

- 内蒙古日注 鲁 冰(40)
草原日影 童翠萍(65)
上海·南通五日记..... 陈学勇(83)
居京日记 赵龙江(85)
杏坛日录 杨育云(89)
美国新英格兰学院毕业典礼日札 贺祥麟(103)

燕语斋书事	孙永庆(105)
邢台乡村二日记	冯兵绪(109)

发现·探索

蒋介石早年日记在美国公开	曹卫国(111)
大陆学者赴美研究蒋介石日记	台中(114)
“两蒋”日记赴美记	赵凌(116)
冯其庸先生的“夹缝日记”	康健(121)

连载·选萃

中国日记史略(28)	陈左高(122)
澈堂日记(8)	自牧(136)
牛棚日记(节选)	陈白尘(154)
“中国十作家永康行”日记	周翼南(164)

辞典·书简·日影

日记文献的类型	邹振环(169)
日记词语试解：自然历、起居注、博客	袁爽之(171)
杨静远信谈日记(附《让庐日记》勘误表)	杨静远(176)
邱忆君信谈日记	邱忆君(102)
浅谈日记的特殊医疗保健功能	杭世金(179)
日记书林折枝	百味(170)
跋	自牧(182)

日记：文献山脉里的“富矿”

[上海]邹振环

日记是应用文中一种最为常用的体裁。一般来说，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进行的创作，日记的作者(以下简称“记主”)往往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抽象的读者和公众。因此，写作日记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创作这类文献时所具有的“非公共写作”的特有心态。就文献的数量来说，日记是文献山脉里最多的“富矿”。日记文献数量巨大，尚未发现的、分散的、未印行的还有大量的留存于世，价值很高者数量还不少，这也是日记文献特别诱惑学者的地方。钱钟书在《复堂日记序》里指出：“简册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左右史记言动尚已。及学者为之，见彼不舍，安此日富。”

日记文献作为文献宝库中一种宝贵的史学资源，实在有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必要。

日记文献强调尊重客观事实。是考订史实、补正历史的重要依据。

“做日记的人，应该有忠实的态度，对自己的生活忠实，对环境忠实，用着一付忠实的态度，由你自己锐利的观察结果，忠实的写出来”。这就是说日记是第一手的史料，一般来说它是回忆录和自传的素材，当然比自传和回忆录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往往可以纠正传主叙述的真伪，揭示回忆者企图隐瞒的事实。日记和回忆录的最大不同，在于日记是记载当事人亲身的经历，一般应是实

录,因此,日记较据正史、传闻记述的故事和回忆录有着更为可靠的真实性,可以据此补订史实。如金安清所著的《林则徐传》称传主主张严禁鸦片,奉旨入京,道光皇帝曾召见过他十九次,但根据后来抄见的《林则徐日记稿》,显然只有八次。像皇帝召见这样的大事,林则徐决不会漏记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李秀成被捕后的乞降变节行为的主要根据一是他囚笼中所写的《李秀成自述》,另一就是曾国藩、曾国荃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赵烈文参与了刑讯李秀成的全过程,他与李秀成有几次谈话,有直接的答问记录。有人怀疑会不会有故意伪造的可能。但就在同一本日记中,赵烈文记录了天京陷落后清军的烧杀淫掠和曾氏兄弟与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的明争暗斗,可见日记的记录是真实的。理论上讲一切重要的历史事件一般都会见之于名人的日记,因此日记还有重要的证伪作用。如通行的教科书现在都称康有为在获

悉《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百二十余名举人至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五月二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递呈。其实当时反对签约的人甚多,有封疆大吏和大批现职官员,也有数百名举人,但据说有上千人签名的这封著名的“万言书”却不见于当时人的日记,倒是一八九五年七月十日的《申报》上刊有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一书的出版广告,此距松筠庵的会议只有六十八天,有人怀疑所谓“公车上书”可能是康有为的一种弄虚作假的“作秀”行为。

日记文献留下了许多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记录,可以补正正史记载的不足。如清末新政中制定了许多新法,但究竟有无起草出宪法一直是个谜,而《汪荣宝日记》手稿中详细和清楚地记录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钦定宪法》的内容和草宪的全过程,以及起草者的观点和心态。有的日记作者,处于显要的地位,接触面广,

处理的事情较多,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写下的政治内幕的消息,处理事件的是非、得失和当事人所负的责任等,常常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如《曾国藩日记》。一般的历史书上很难知道清代皇帝是在什么时间会见大臣的,而在日记中我们就知道清代皇帝是在清晨处理政务的,因此住在紫禁城外的军机大臣半夜就得入值,军机大臣王文韶日记、《曾纪泽日记》都记述他们是半夜二时办公。因此清朝中国官员多不能参加驻京外交官的晚间活动,这是否影响中国官员了解外交信息还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上述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在正史中无法看到的。

日记是研究历史人物最好的素材,也是记主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记录,因此是研究历史人物生平与思想的宝贵文献。

林华《日记文作法讲话》一书中指出:“人类的心理好似海洋的波浪一样,时常千变万化的,日记的作者,不特要写出自己内心生活态度,并且要分析揭破自己心

理的变化——变化的姿态和变化的历程。”日记除了记录历史人物的活动外,还常常记录了个人生活中的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可以说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书札。作为最纯粹的私人写作,日记反映了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而这些恰恰正是正式的官方史书中所缺乏的内容。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写道:“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正因为日记有私密性这一特点,因此记主在日记中常常直抒胸臆,臧否得失,畅言无忌。其中可以看到许多历史事实的真相,和作者本人最真实的想法。张佩纶的《涧于日记》,对其岳父李鸿章在甲午后屈膝求和,认为负疚实深,还不及深闺中的女儿。张謇的日记中,根据他长期与张之洞的交往,他写下了南皮有五气的印象:少爷气、美人气、秀才

气、大贾气、婢姬气。这些真实看法往往只能在日记中才能找到。《郑振铎日记》中记有他喜欢“雀战”，并多次在日记中发誓戒赌，但又再次重犯。《郁达夫日记》中很喜欢记载钱塘江畔花牌楼和杭州拱宸桥两地的妓寨和妓院，宋云彬日记也记述自己和徐铸成在解放后还逛过八大胡同的妓院。这些日记作者在世时是肯定不愿意将此类日记内容公之于众的。无怪乎邓云乡称：“我最爱看古人日记，在日记中看到的大都是活泼泼的坦率自然的活人，在文集中看到的则是衣冠整齐、道貌岸然，甚至装模作样的假人，而在历史书中则常常看到的是斧削的或殡仪馆化了妆的死人、假人，死人自然都没有活人亲切好看。”一些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往往为了保证私密性，而采用一些特殊的符号和文字，如赵元任的日记，有时使用五线谱。有时是图像，有时是外文和方言，有时夹杂着只有其本人才明白的符号。日记文献是记主自己内心的最为隐秘、最

为深刻的思想的独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记也是思想史和心态史研究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日记选材形式的广泛性，使日记中常常保留了各种问题大量线索。是解剖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绝好资料。

一些记事备忘日记往往会留下关于社会生活的广泛记录，如著名学者浦江清在一九二九年初的日记中记述自己所记日记的宗旨：“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想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其所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中留下了当时南北市场的行情、战后大后方民生艰难、解放之际北平海淀货币流通的实况。普通日记多记录日常天气的实况，这就为气候的变化，为一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古代的气象学提供了可贵的数据。

西方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研究，一直是比较难把握的内容，

因为清代许多学者都讳言自己受西学的影响或自己在异域环境中因为文化差异所陷入的窘境，但日记中却往往会留下一些非常真实的记录。如一八八六年出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的张荫桓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因为不懂外语而常常在外交场合陷入窘境，如一八八七年二月三日晚上“赴总统宴，不带翻译”，结果搞得非常狼狈：“余不谙西语且不认识，真无从周旋。”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三日他与美国和法国机器师同舟外出，两位“时为余排闷，特言语不甚通，翻译又不暇，仍闷而已。”而同一场合的日本使节：“倭使携妇致敬，西装西语，灵慧趋时”，与自己的笨拙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强调在中外商业贸易中掌握外语同样至关重要：中西人合股生意“当在华订办时，西人巧为迎合，方深信之，及抵外洋，言语不通则事事受其挟制”。华商杨兴赴西班牙参加“赛会”，“亦为西人所挟”，“此皆不谙西语之亏也”。这些有意思的记录在正式

的官方文件档案里都是无法看到的。

日记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的个人编年体史书，宋教仁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我之历史”就是这层意思。编年体创作最初是属于官方编写历史的文件，如《春秋》所依据的鲁国史书，也可以视为一般不记载个人琐事的国家性质的“集体工作日记”。私人“逐日记事”形式“日记”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解放。日记以鲜活的日常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正史所缺乏的丰富的民间社会活动。这种私人日记数量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一种新的文献种类，即日记文献，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了历史记述以不同的面目。日记文献将历史的记述从官方文献的纪事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民间语文”，打破了传统正史文献在历史表述上的话语垄断，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2006年2月27日《北京日报》]

《雷锋日记》出版内幕

邱 宏

七十六岁的冯荆育老人，为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原社长、正师职退休干部。退休后，他一直热衷于关心下一代事业，先后被评为沈阳市学雷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关心下一代优秀个人等称号，还被授予“全国先进军队退休干部”。

在《前进报》工作期间，冯荆育曾参与了《雷锋日记》的编选工作，并撰写了众多学习雷锋的文章。

参与编选《雷锋日记》

据冯荆育回忆，一九六二年二月，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期间，他以军区《前进报》编辑身份到会采访时，与雷锋见过一面。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雷锋因公殉职。一九六三年一月七

日，雷锋生前所在四班被授予“雷锋班”称号；同年一月十八日，沈阳军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指示：树立雷锋式典型，培养出更多的雷锋式战士。军区政治部要求《前进报》编选《雷锋日记》，总编辑嵇炳前确定，由党政组组长董祖修负责。

一九六三年一月下旬，董祖修从军区文工团借来十人，将雷锋遗留的九本日记、笔记全部抄录下来，准备仔细核对后进行选编。由于当时的任务很重，有关领导考虑到冯荆育曾参与编辑部队速成中学语文教材，当时他负责编辑《前进报》第三版“党团生活”、“思想战线”、“学雷锋讨论专栏”等栏目，于是，便让他参加编选《雷锋日记》。

认真考证雷锋原文

据冯荆育介绍,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原则编选《雷锋日记》,力求保持原文、原意和日记的完整性。

对雷锋遗留下的日记,他们按照时间顺序,一天一天地核实、鉴别。其中,雷锋记录生活、工作、学习的日记,很容易认定;但部分日记记录了一些富有深刻寓意的精辟论段、名言警句等,就必须仔细分析。因为,其中有的是雷锋写的,有些似乎不是。

对照雷锋的笔记本可以看出,雷锋平时看了很多书,作了不少摘记,有的注明出处,有的并未注明。他们必须翻阅大量资料,经过多方查对,才能进行增删决定。比如,有一篇精辟议论:“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个人自己的历史。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共青团员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我要永远保持

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

当时,冯荆育老人仅仅根据“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该想一想”这句,就认为是雷锋自己写的,便将这段话保留下来,并在最早的《雷锋日记选》版本中,列为第一篇。

多年后,他发现这段话摘自中央党校杨献珍的一篇文章。于是,他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雷锋日记》再版时,便删去了这段摘记。

咬文嚼字精心编选

在编选中,他们对雷锋遗留日记中的引语和事实,都要进行认真核对。雷锋日记引用最多的是毛泽东语录,还有其他名人的引文。对雷锋日记中有关事实过程、人名、职务、单位、番号、地名、时间、数字等,都要一一核对,不允许出现半点误差。

此外,还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比如,文字和标点符号,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只改正个别错字和用词不当而影响原意的词语。为了保密,他们将雷锋日

记中的部队番号,一律改成××部队;将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名,改成×××。经过反复研究,还将部分语义重复,过时的话语、用词等,做了删节。

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军区政治部将《雷锋日记选》报送总政治部宣传部审订,并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前进报》发表“雷锋日记摘抄”,冯荆育又认真校对了一遍。

一九六三年二月,根据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的意见,总政治部宣传部要求核实《人民日报》刊载的《雷锋日记选》。董祖修和冯荆育把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雷锋日记,再次认真对照核实,向总政治部宣传部做了汇报。以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又进行了个别改动,最终形成了现在的《雷锋日记》。

撰文宣传雷锋精神

四十多年来,冯荆育一直坚持宣传雷锋精神。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沈阳军区隆重召开大会

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一周年。冯荆育在《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社论。一九六五年三月,他再次撰写了社论《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在《前进报》工作期间,冯荆育老人长年编撰“向雷锋同志学习”专栏,以及宣传军区学雷锋的先进典型,并先后组织“怎样做雷锋式的革命接班人”、“怎样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大讨论。

一九九〇年,他参加编写了,《让雷锋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新时期学雷锋讲座》。其间,他根据雷锋一九六〇年六月五日的日记:“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撰写了该讲座中的第八讲《高标准与低标准——谈谈雷锋艰苦奋斗的精神》。

参与编撰《雷锋志》

一九七七年,冯荆育老人参加了白山出版社一百九十多万字

《雷锋志》的编审、校对工作。

在编辑《雷锋志》期间,有人送来一本他搜集的散佚雷锋日记。《雷锋志》主编关殿军交给冯荆育处理。作为编审之一,他认真调查考证,最终发现这部分日记中有些是读书摘记。冯荆育当即提出意见:这些散佚的雷锋日记,不能选入《雷锋志》。主编肯定了他的意见,避免了失误。

二〇〇三年,一家纪念馆要出版一本弘扬雷锋精神的资料汇编,出版社邀请冯荆育做责任校对。在文字上,他提出了不少意见,都得到采纳。该书将“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一段话作为雷锋日记,列为第一条。他提出意见:这不是雷锋日记,而是中央党校杨献珍的文章摘录应该去掉。可是,令冯荆育老人遗憾的是,该书出版后,仍然保留了这段话。

终生宣讲雷锋精神

一九八七年,冯荆育老人退休后,仍然坚持宣传雷锋精神。二〇〇三年是毛泽东同志为雷锋

题词四十周年,他先后为社会各界作了十二场题为《发展市场经济,仍需无私奉献》的学雷锋报告。四十多年来,冯荆育老人坚持宣传雷锋精神,已被许多学校聘为学雷锋辅导员。他还教育子女学雷锋,儿女们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退休后,冯荆育老人曾先后参加了省、市十一个报告团,编写传统教育材料和讲稿一百五十多万字,做报告三百二十多场,听众达十二万多人次,先后获得全国、省、市等五十二项奖励。他深深感到,要像雷锋那样,无愧于共产党先锋战士的称号,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冯荆育老人曾深有感触地说,一本书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毛泽东选集》影响了几代人,雷锋把它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用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而《雷锋日记》这本书,又影响了冯荆育的后半生。

[原载 2005 年 3 月 5 日《齐鲁晚报》]

宋子文西安事变

日记揭秘



佚名

宋子文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一万多件资料,是宋家最后的秘密。宋美龄去世之后,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这批材料。这批档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宋子文亲历西安事变时记下的日记。

——题 记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

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二十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二十五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十五页。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二十日上午十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

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十七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 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 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 发动抗日运动；4. 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对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张学良扣没蒋遗嘱

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一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 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 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

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 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宋被怀疑策划西安事变

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宋子文到南京后，首先与宋美龄、宋霭龄和戴笠商谈对策。他们均赞同宋的方案。然后，宋才向国民党要员汇报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和他的计划。

宋子文记录道：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